

邓小平同志批示编辑出版《藏汉大辞典》考略

拉巴平措

[摘要] 本文通过考证,阐述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历史转折中,邓小平同志百忙中就编辑、出版《藏汉大辞典》所作出的重要批示,并对此举给予高度评价,“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藏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了”。文章对中国藏学发展年代的划分和时期的界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 藏学工作;邓小平;1978年;《藏汉大辞典》

[中图分类号] Z38 + H1“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557(X)(2015)01 - 0005 - 03

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就编辑出版《藏汉大辞典》工作作出批示,不仅使这项工程得以完成,而且对我国藏学工作和民族文化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13年9月26日,北京民族出版社举行该社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还举办了成就展。成就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是邓小平同志对编辑出版《藏文大辞典》的工作作出批示的有关情况。被邀请参加纪念活动的我,看到这些内容很兴奋,立即把有关图片和文字说明用手机拍了下来。后来,在仔细翻阅这些资料的过程中,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考证,现将有关看法整理如下:

首先,关于邓小平同志对方毅同志的来信所作批示的时间和内容问题。

在民族出版社展览的这段内容中,有两件照片两段文字说明。一件是方毅同志的来信和有关批示的照片,以及该展板的一段文字说明。其中写道:“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中科院方毅同志就编辑出版《藏汉大辞典》的请示信上作出批示。”^①这里的关键是“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中科院方毅同志……的信上做出批示”。另一张照片是《藏汉大辞典》,它的文字说明是这样写的:“张怡荪教授花费半个多世纪心血编纂,抗战末期完成初稿,1951年开始几度修订,‘文化大革命’中又停顿。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方毅的亲笔信上对出版该书作出批示。组成包括我社编辑在内的30多位藏汉专家的编委会。又历6年完成,1985年出版。”^②这段文字,应该说非常简练而清晰。关键是“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方毅的亲笔信上对出版该书作出批示”。

但是,我们稍微仔细看一下方毅同志的信和邓小平同志的批示原件的照片,觉得这里所说的时间与

^① 北京民族出版社成立60周年成就展。

^② 同上。

批示原件照片上的时间有出入。也就是说,照片原件上方毅同志非常清楚地写着:“七七,十二,廿四日”。虽然小平同志签署的日期在照片中看得不太清楚,但批示内容是“请乌兰夫同志酌处”。接着,乌兰夫同志写的是:“请小鹏、李贵同志办理。12/28。”所以,小平同志批示时间应该在24日和28日之间,似乎是:“十二月廿七日”。^①这就是说,方毅同志的信是1977年年底写的,小平同志批示时间也是1977年年底而不是1978年。

我们再来看看张怡荪主编是怎么说的。他在1978年10月写的自序中说:“77年年底,我给邓小平同志和方毅同志写信,申诉我的愿望,邓小平同志、方毅同志、乌兰夫同志亲自作了批示。”^②这段话也证实了“77年年底”。那为什么展览说明一再说是78年,而且是1978年4月呢?

其次,邓小平同志就《藏汉大辞典》有关工作是否还有一次批示,即第二次批示呢?

张怡荪教授在自序中还说:“今年(78年)2月,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出版局就恢复《藏汉双解大辞典》的编写问题给邓小平同志写了报告,报告提出,请四川省民委具体负责词典的编纂工作,由川、藏、甘、青等省、区和北京民族出版社等有关单位抽调藏文水平较高的同志担任编写,由中央、西藏、青海、西北、西南等五个民族学院各承担部分词条的审稿任务,使辞书能早日编完出版。”^③从这段文字显而易见的是:“今年(78年)2月,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出版局就恢复《藏汉双解大辞典》的编写问题给邓小平同志写了报告。”也就是说,在1977年的批示下达后,国家有关部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解决相关问题达成了共识,提出了方案。然后将有关意见呈报邓小平同志批准。这里虽然没有说邓小平同志对该报告作了批示,但是人们从随后的一系列举措中可以清楚看到此事得到正式批准,《藏汉大辞典》编纂出版的实质性工作正式启动了。张怡荪教授自序中写道:“今年(78年)5月,国家民委和国家出版局负责同志在成都主持召开了《藏汉大词典》编纂工作座谈会,并成立了领导小组,现正领导着由各地抽调前来成都的全体同志进行紧张的编辑工作。计划要在三年内,以这次付印的初稿为基础,广泛征求意见后,进行补充和修订。要求辞书正式出版后,在国内对读者有较大的帮助,在国外有较好的政治、学术影响。要达到这一标准,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④1984年11月由《藏汉大辞典》编纂组的名义写的《前言》中也写道:“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藏汉大辞典》于1978年重新恢复编纂工作。是年五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原国家出版局,在成都主持召开了编纂工作座谈会,成立了领导小组,任命原四川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扎西泽仁为组长,领导全组同志展开编纂工作。1979年,出版了《藏汉大辞典(征求意见稿)》,以此为基础,进行补充和修订。……”^⑤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如民族出版社展览的解说词所说的那样“78年4月”邓小平同志正式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出版局的报告。

再次,关于这次批示的最初缘起。

关于邓小平同志批示的最初缘起或起因问题,我们在上面引述的张怡荪教授的自序说:“77年年底,我给邓小平同志和方毅同志写信,申诉我的愿望,邓小平同志、方毅同志、乌兰夫同志亲自作了批示。”^⑥民族出版社成就展所展示的原件照片是难得的历史文献,下面我把方毅同志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原原本本转抄下来,让我们记住这一历史性的事件:“邓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原川大教授张怡荪据了解现已八十多岁,他从解放前即已从事编辑藏汉大辞典,解放后,这一工作初在川大文科研究所进行。1958年改归科学院四川分院,后又改属民委。1964年张曾来京向民委汇报,民委召集座谈会,对原稿予以肯定,认为超过了现有藏文辞典水平,值得出版,同时提出增补意见。这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停顿了,但稿件和卡片留存四川省民委。本人要求把这项工作加以恢复,因而写信给我。

① 北京民族出版社成立60周年成就展。

② 《藏汉大辞典》自序。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藏汉大辞典》前言。

⑥ 《藏汉大辞典》自序。

此事不属中国科学院，我不便处理。但我认为这是一件重要工作，应予支持。是否可请您批转中宣部和中央统战部电请四川省委恢复他要进行的这一工作，保证安排他工作中所需要的各项条件。妥否，请批示。方毅 七七，十二，廿四日”^①以上信件十分清楚地记录了方毅同志收到张怡荪教授的信件，以及他为什么把这件事向邓小平同志报告的理由，还有方毅同志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建议，看后令人感动。

最后，关于《藏汉大辞典》的名称问题。

在张怡荪教授的自序中说：“（78年）2月，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出版局就恢复《藏汉双解大辞典》的编写问题给邓小平同志写了报告，”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原名《藏汉双解大辞典》改成了现在的名称了呢？其他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解释。但是我们看完方毅同志的信之后，才恍然大悟。在这封信中写道：“他（张怡荪）从解放前即已从事编辑藏汉大辞典……”^②，可见，信中用的就是《藏汉大辞典》这一名称，而且此后一直按照这一名称运作。所以可以肯定，张怡荪教授一开始向方毅同志反映情况时，就用的是这一名称。

总之，1978年4月，就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刻，邓小平同志在百忙中就对编辑出版《藏汉大辞典》作出了重要批示，从而使这部历经几十年艰苦努力，并凝聚着藏汉等各族专家学者心血的重要工程不仅重新启动，而且在不久的时间里，正式出版发行，成为国内外藏学家和藏族文化爱好者们必备的工具书。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向世人宣告，中国藏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本文责任编辑 央珍]

[作者简介] 拉巴平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101）

^① 北京民族出版社成立60周年成就展。

^② 同上。